

黎明前的 沉思与憧憬

LIMING QIAN DE CHENSI YU CHONGJING

1948年文集

刘绪贻 著



武汉出版社

黎明前的 沉思与憧憬

LIMING QIAN DE CHENSI YU CHONGJING

——1948年文集

刘绪贻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 年文集/刘绪贻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10

ISBN 7-5430-2327-X

I. 黎… II. 刘…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550 号

书 名: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 年文集

著作责任:刘绪贻

责任编辑:廖国放 邹德清 李艳芬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24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ISBN 7-5430-2327-X/C·56

定 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1)
知识生活的偏向	(4)
风雅里的悲剧	(10)
狭路相逢	(19)
两种克服自然的知识活动及其冲突	(26)
人性的压抑与了解	(36)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7)
退无以守,进必以战	(58)
锦上添花的代价	(67)
知识·生活·宇宙	(74)
道德的眼镜	(83)
长指甲里藏着什么?	(91)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后	(99)
生育节制与儿童福利	(113)
工业化的利弊	(118)
富贵之道	(123)

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 年文集

文化的渐变和剧变	(129)
中国需要全盘地变迅速地变	(140)
民族性与文化	(147)
从“镜中自我”里看民主	(155)
装饰性的文化	(164)
看不见的牢狱	(173)
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	(178)
狂澜	(183)
后记	(188)

序

1947年夏,我从美国回来,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天下事、国家事、民族前途、人民命运等等,想得很多,有许多话要说。在教学工作初步站稳脚跟后,便发愤写作。1948年至1949年1月在上海、北平、南京和天津等市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30篇。有些朋友和学生认为,这些文章中探讨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并未完全消失,有的还显得很顽强,在隐蔽一个时期以后又出来兴风作浪,阻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这些文章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于是,我选了发表在上海《观察》和《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与《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杂志上的23篇结成一个集子,题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全书约15万字。

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三类。(1)属于社会学范畴的15篇,其中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的11篇,发表于储安平主编的上海《观察》杂志,影响较大,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共鸣信;这些读者主要是大中学生,也有留学生、持异见的国

民党军政人员、甚至还有僧人。储先生曾要求我集结起来列入《观察丛书》，和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乡土中国》一同出版。因为我当时已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有所顾虑，婉言谢绝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当年读过这些文章的学者，仍有少数人函询是否结集出版过。(2)属于文化人类学的6篇，其中有两篇发表在上海《时与文》杂志，当时也受到较广泛注意，并引起争议。(3)时论2篇，其中1篇揭露国民党打着民主的幌子顶多也不过实行“民本”政治的文章，颇受欢迎。

1948年我写这些文章时，政治上早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在学术思想上，我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是较彻底的，而在中学、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受长期教育，则使我未能完全摆脱它对我的思想影响。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是以社会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结合旧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这些问题不是国民党腐朽反动统治的那些表面问题，而是形成和延续这种统治的、较深层次文化思想问题，所以比较能触动知识份子的灵魂。在体裁和风格方面，由于我想尽量扩大读者面，虽然很注意文章的科学性，但不是正式科学论文，尽量少用专业术语，使之多少有点接近于杂文、随笔，具有一定可读性。

这些文章中，虽然有少数内容和遣词用字，要是我今天重写，会有些改动，比如对中医的看法会写得更全面，

“知识阶级”会改为“知识阶层”，宜于用“地”的地方不用“的”，许多数目字会改用阿拉伯数字，等等。但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当时是怎么写的，基本仍旧。

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罗教讲所长的支持下，罗芳女士为我打印了全部书稿，在此深致谢意。

2000年6月10日于珞珈山

知识生活的偏向

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的脱节

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尤其是离开原始生活较远的社会里面,都有一群人,靠获取、传授、或运用知识过活,从经济的观点看,这便是贩卖知识。这种人,我们通常称为知识份子。事实上,人类的生活行为,除开很少的几种本能反应以外,大部是学习得来的,里面都多少包含着知识的运用。比如一个农人,并不是生来便会种田的,因为种田也需要关于播种、加肥、除草、收获、天候、土壤等知识;愈是要做一个好的农人,需要这一类的知识也愈多。石工木匠,至少也得要懂得如何应用规矩绳墨,做生意要先当学徒,这表明工商行为也是不能与知识绝缘的。不过,这些人的生活行为虽然与知识有关,但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知识的获取与运用是混杂在一起的;即使有距离,也不会太远。做生意和做手艺的人,虽有一个当学徒的时间,但他们在此时间所学的知识也同时在应用。第

二,这些人的知识都是和生产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生产劳动,他们的知识便没有什么用处。

至于知识份子的生活行为与知识的关系,则与此不同。第一,他们获取知识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亦即获取与运用知识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距离,所以凡是闲暇少的人都做不到。第二,他们获取与运用知识的活动,是和生产劳动无关的,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一个人变成一个知识份子的过程,便是他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过程。

由运用知识方式的不同,知识份子可以分成许多类。在旧时代的中国,大约只有做官的和教育的两种。现在,除了公(包括文武两种)教人员以外,还有其他自由职业人员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工程师、新闻记者等。由于职业的分化,各种知识份子对于社会的作用不同、影响不同,此地篇幅有限,暂难详说。不过无论职业如何分化,他们有一点总是相同的,即如前面所说,培养他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他们的工作,又和生产无关,不能,至少不能直接增加财富。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需要社会来养活的人。

尤有进者,根据美国经济学者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析分析,一个知识份子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途程愈远,身份也便愈高。所以从前中国读书人的面孔白、吃饭少、指甲长、多愁多病等,俗话称为“秀气”,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愈是“秀气”的人,也便愈为社会上一般人看得起。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这包括两层意义。第一,愈是“秀气”的人,愈是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照顾的力量,因此便得一批人服侍。读过《红楼梦》的人可以算算,

服侍贾政和贾宝玉这两个宝贝的，直接间接一共有多少人？目前也许不容易找出这种极端的例子，但仍然办公室里工友，家里有厨子、老妈和车夫等。这又是一大批不生产的人。所以，一个社会里靠贩卖知识的愈多，不生产的人便加速度的增加；相对的，生产的人与生产物便愈减少。第二，脱离生产劳动而身份又高的人，一定要有些东西来表明他们的身份。于是，他们吃要吃得好些，穿要穿得漂亮些，玩要玩得巧些。生产这些好食物、漂亮衣着、和巧玩具的劳动力单位，自然比生产普通食物、衣着和玩具的劳力单位要多些。所以社会上这种身份高的人愈多，社会的生产负担也便愈重。

既然从生产的立场看，知识份子在社会上是一个纯粹的负担，所以每一个社会，如果生产的技术不变，其能养活知识份子的数量，亦必有其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这个社会便要出乱子。一方面是生产者，尤其是农民的暴动；一方面是知识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分化中，一部分知识份子或者为了钻不进“既得利益”的那一群；或者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为生产者抱屈；或者两种原因都有，于是组成团体，往往与暴动的生产者结合，反抗知识份子中的“既得利益”。这种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完全脱节的社会结构，实在有改弦更张的必要。

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的间接联系

要补救这种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完全脱节所引起的缺陷,不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并不是要把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起来,因为社会分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愈是文明的社会,分工愈复杂,愈有必要。只要 we 不想恢复原始生活,只要 we 不想“率天下而路”,我们便不必企图劝从事知识活动的人,同时也去种田、做工、或经商。不过,从事知识活动的人,虽不必同时去种田、做工、或经商,也不必尽去谈玄说理,吟风弄月,却可以做些更有用的事,这便是帮助种田和做工的人去改良种田和做工的方法,以增加生产。这便是自然科学发达以后,西洋和日本一部分知识份子所走的路。这一部分知识份子,也需要长期训练,也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是他们的活动,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和生产劳动间接的联系了起来。我们这里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举出例来,说明科学家与工业家等,怎样用育种、防虫、防旱、灌溉、运输、肥料的改良、机械的应用,以及科学管理等等,来帮助农人和工人增加生产。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事实,便可以有个整个的概念。北美在白种人没有去以前,只住着少数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中,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生产的。但当时北美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化;全部人民,都度着原始或者近似原始的生活。三四世纪以来,白种人把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带到了

这块地方,而今,这同样一块地方,不独养活了更多更多的人;而且,北美的生活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九四六年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美国约一万万四千万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二千五百二十万人。相反的,他们的知识活动加多了,全国强迫教育都到了高中的程度,好几州更到了两年毕业的大学程度。靠获取与传授或应用知识为生的人,在全人口中的比例,更是有增无减。这都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间接联系起来了的结果。

我们知道,纵然不像维布伦所说,脱离体力劳动或生产劳动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倾向,至少也是林顿(Ralph Linton)所谓普遍文化型。因为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里面,人们只要以知识生活来脱离直接生产劳动,都是会如此作的。所以,每一个社会里面纯消费的知识份子,只要是没有特别阻碍,总有增加的倾向。不过,如上所说,除非我们把知识生活和生产劳动,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间接联系起来,一个社会担负知识份子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社会知识生活的偏向

从上述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生活,无疑的,两千年来,我们的知识生活是走了一条偏路。从西汉以来,我们

的读书人便看不起“奇技淫巧”，禁止言“利”。我们只要读一读桓宽的“盐铁论”，便可以看出这种偏向的程度。其结果，我们的知识生活完全与生产劳动脱了节，读书人变成社会上的纯粹负担。历史上，往往到了社会上知识份子达到饱和程度，遇着此路不通时，也有出来补偏救弊的人，如刘晏、王安石、张居正、徐光启等，但终因势孤力弱，难挽狂澜于既倒。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有意无意的觉悟了这种偏向，于是办新学堂，派留学生，但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想把知识生活与生产劳动间接联系起来的企图，都仅止于获取知识这一段，（也许有人以为到了传授知识这一段，但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传授的也只是我们受训练时获取的知识，并不是后来自己研究的结果。）没有再向前走。因此，我们农人以及大多数工人，尤其是农村中手艺工人的生产方法，仍然留在旧时代，养不活更多的人；也无法提高我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偏向的知识生活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民国以来，我们的新教育制度造出了更多更多的知识份子，更多更多纯消费的人，这些人都有个安插的所在，官场中，当教授虽然还没有饿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大批人去把知识生活和生产劳动间接的联系起来，官与投机家终是要被清算的，教授也有一天是当不成的。

〔注：此文 1948 年 1 月 30 日发表于上海《观察》杂志第 3 卷 19 期〕

风雅里的悲剧

风雅及其所包含的价值判断

人类知识活动可以分成好几个方向,其中一个,主要是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并供给旁人娱乐为目的,大体上说,包括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在一个分工很简单的社会里面,专门靠贩卖知识为生的人极少,文学和艺术的遗产有限,于是,这一类的知识活动,大都和当时当地大众的真实生活紧密地联系着,脱节的时候,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我们不必在别的原始社会中去找例子,我们的《诗经》,便大都是有周时候各个地方民众生活的反映。就是在一个分工比较复杂的社会里,专门靠贩卖知识为生的人很多,文学与艺术的遗产相当丰富,但如果社会变迁迅速,传统的力量小,这种知识活动和当时当地大众的真实生活也不会离开得太远。比如,美国目前的文学和艺术,便是和美国社会里一般人的生活很接近的。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一方面,分工的程度可以养活一批靠贩卖知识为生

的人；另一方面，文学与艺术的遗产丰富，而这种遗产，又因社会变迁小，藉着传统的力量，控制或影响当时的文学与艺术，于是，以抒发自己感情，供给读者娱乐的知识活动，往往会慢慢的和当时当地的大众生活脱节。这种脱节的现象，在我们知识生活的传统里，称为风雅、典雅、风流、或者其他类似的名词。

造成风雅的过程，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一是脱俗，一是返古。所谓脱俗，便是在文学与艺术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之间，做一种隔离的工作。比如说，在大众的生活经验中，时常有钱不够用的感觉，然而文学与艺术很少描写这种大众的经验，因为一谈到钱，便落了俗套。又比如，社会里面，尤其是非工业的社会里面，大部的人，都是不能离开生产劳动的；而且在生产劳动之中，往往有许多痛苦的经验，文学与艺术，尤其是我们民国以前的，和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文学与艺术，大都不喜涉及这种经验，因为也有不能脱俗的嫌疑。反过来说，风花雪月、才子佳人、观鱼跃、听鹿鸣等等，都是与大众日常生活距离得很远的事物。这些事物，往往是文学与艺术，尤其是旧时代的文学与艺术，描写的对象；也便是风雅的大来源。从另一个观点说，日常生活，尤其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些活生生的事实；日常生活既然不雅，活生生的东西也便是俗，反过来，有很多风雅的东西都有几分死意。一颗年轻花盛的梨树不雅，但一株枯梅，几片花瓣，便雅意十足。一个年轻力壮的女人正在厨房中工作，简直没有雅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僧静坐在禅房之中，才了无俗态。旧词中有一首“枯藤老树昏鸦，小

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大有死意的，可也十分风雅。其次，日常生活是真的，不雅；要雅，便得是假的，至少有些假意，所以画家们笔下的钓翁，往往持着一个没有鱼钩的钓竿，因为真钓鱼，或者为了生活而渔，便有俗气。所谓返古，便是在现代人的文学与艺术的作品里面，参加一些古代人留下来的文学与艺术的遗产。（其实这也是一种把文学与艺术和实际生活分开的勾当，但为了分析得比较清楚起见，所以我们将之另列为一类。）这种返古的活动，大略也可以分成三类：有仿古，便是让古代人文学与艺术的体裁，指导现代文学与艺术的活动。字要颜、柳、欧、苏，文要魏、晋、六朝，诗有仿李、杜，仿苏、黄；画有仿米襄阳，唐伯虎等等。有引古，（恕我自造一个名词。）或者把古代的字引用在现代的文学作品里面。不独字形要古，连字音字义也要古，所以“和”字要写成“龢”字，“予”字要看《诗经》里是怎样用法怎样读音；或者把古人作品里词语和情节引用在现代人的文学与艺术的作品里面，普通称为用典，往往一篇文章，完全是典，用从现代生活经验中所得知识去了解，简直不可能。也有冒充为古的，玩金石字画的人，尤其是贩卖金石字画的商人，为了要把金石字画弄得古色古香起见，甚至用各种方法，例如把铜器埋在土里，用烟熏字画等，把现在的金石字画，装成古代的，藉以鱼目混珠。

综合以上所说，凡是离开实际生活，尤其是大众实际生活的；或者是返古的文学与艺术的活动，便是平常我们所称的风雅。

所谓风雅，往往包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那就是说，